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02

# 发展和挫折

## ——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

### 历史经验研究综述

文 浩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挫折期,其整体格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成为权威文论话语,其历史经验表现为毛泽东文学思想逐步经典化和权威化;人民性、阶级性、大众化成为塑造权威文论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周扬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和实践性上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被批判”或者“边缘化”文论的思想价值丰厚;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初步建构起来;文学理论建构方式上出现了多向创生的典范。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研究遵循了不同路径,表现为整体化研究不断深化,毛泽东文学思想、周扬文学理论及其重要命题、胡风经典文本、关于“现实主义”重大论争等典型个案研究收获颇丰,教材和课程的中国经验研究日益精细,新方法新路径大量涌现和交叉使用,等等。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历史经验; 毛泽东文学思想; 文学理论教材; 整体化研究; 典型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09-09

**引用格式:** 文 浩. 发展和挫折: 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综述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9-17.

## Development and Frustration: A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on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1949 to 1976

WEN 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o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76 is seen as development and frustr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overall situation is that Sinicized Marxist discourse of the literary theory has become the authoritative one. It h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cluding the gradual classical change and authoritarianism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s; People's character, Class character and Popularization as the key words

收稿日期: 2019-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文 浩(1981—),男,湖南桃源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和文艺美学。

to shap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uthoritative literary theory; Zhou Yang's strong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utonomy and practicalit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ich ideological value of "criticized" literary theory or "marginalized" ones; initial construction on Sinicized system of textbook and curriculum of literary theory; creating paradigm of multi-direction creation in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literary theory. The study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eriod has followed different patterns including systematacial studies deepening ceaselessly; typical case studies reaping a bumper harvest such as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s, Zhou Yang's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important propositions, Hu Feng's classical text, the major debate on "Realism";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experience of textbook and curriculum of literary theor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ne; emerging methods and paths cross-used massively.

**Keywords:**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 systematacial studies; typical case studies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第一届文代会召开,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挫折期。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整体格局是统一的,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在新中国成立后数次理论论争中发展为权威文论话语。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解放区文论话语发展为新中国权威文论话语。这一文论话语强调人民性、阶级性、大众化。这一时期的文论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发展期,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得到较好发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逐步形成自己的体系,当然也出现了僵化和左倾的现象。第二阶段为挫折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阶段即“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利用最高领导人的某些失误,推行极左思想,“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极左文论泛滥,文学理论出现严重的反智化反现实的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遭受挫折。

## 一 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之历史经验

(一)毛泽东文学思想逐步经典化和权威化,人民性、大众化和阶级性成为核心概念和思想基础

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延安讲话》的不断经典化和权威化。《延安讲话》是毛泽东

文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1953年版和1966年版《延安讲话》。修改后的1953年《延安讲话》版本比1943年版的《延安讲话》更加严谨和清晰,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新现实。以《延安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受到不断被译介到中国的苏联文艺学学派教材和理论的补充和支撑,还得到周扬、茅盾等国内文学理论权威的不断阐释和研究,最终被确立为权威性文论话语。二是《延安讲话》凸显的人民性、大众化和阶级性成为这个历史阶段文论话语的核心概念和思想基础,也是这个阶段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时代特色。从1943年到1966年,不同版本的《延安讲话》对“人民性”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文学思想将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视为所有文艺问题的关键。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它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方向。人民性是大众化和阶级性的基础,大众化和阶级性是人民性的显要特征。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要服务的对象不是一小撮特权阶级和剥削阶级,而是占到人口绝大多数的革命群众,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必须要走大众化的道路,这样才能完成服务广大人民的根本任务。同时,人民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中有明确的阶级指向:以工农兵为主

体的革命群众和劳动阶层。人民性并不意味着全民性，其基于文艺纯洁性和革命性的要求而将文艺活动参与者划分为不同阶级主体。三是 1958 年毛泽东首次提出文学创作要实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后来经过周扬的阐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简称“两结合”）成为权威文论话语推崇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文艺工作方向。“两结合”是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中国文论界试图摆脱苏联文艺学模式、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大胆创新。“两结合”取代苏联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至少说明了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上出现了明显的自主化和民族化趋向。不过，“两结合”的提法如果成为唯一普遍的创作手法，也存在简单机械的弊端。四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在“人民性”“民族形式”“普及与提高”“两结合”等理论问题上的创新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毛泽东文学思想树立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典范。五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在发展实践中功绩和失误并存。一方面，毛泽东文学思想在团结文艺界、繁荣文艺创作、文艺民族性和进步性、文艺支持革命斗争和鼓励新社会建设等新中国成立后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实和中国文艺创作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加上极左思潮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扭曲和利用，造成了“文革”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倒退和发展挫折。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性和斗争性理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化，这是造成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文艺界诸多失误和悲剧的重要原因。

## （二）周扬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自主性和实践性

周扬是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时期毛泽东文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权威阐释者。一方面他宣传阐释毛泽东文学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文学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中国文论的自主性和实践性发展有强烈的理论自觉。周扬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上的主要经验和贡献为：一是周扬提出了“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1956 年）和“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1958 年）的命题。他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主张民族性，其理论主张凸显出中国特色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自主性。他在《河北日报》（1958 年 8 月 22 日）发表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一文。该文在倡导建构社会主义民族的新文艺的同时，在 20 世纪百年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这种文艺理论和批评，

“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研究和总结本国文艺实践的经验，按照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sup>[1]</sup>周扬反对将马列主义条文和外国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文学现实中，反对洋教条；同时，他也批判脱离中国群众新文学实践的修正主义文学观。这体现了中国学人在克服日益教条化的前苏联文论模式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方面的理论自觉。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特色文论建构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凸显、多元性和对话性微弱。二是周扬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 年）一文中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主张。他将“人民群众”界定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考虑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人民”内涵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观点符合实际，克服了《延安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提法的狭隘性，增强了毛泽东文学思想的阐释效力和实践价值，丰富了毛泽东文学思想的“人民性”内涵。

## （三）“被批判”或者“边缘化”的文论思想具有辩证性、丰富性和承接性

在这个历史阶段，被权威文论话语所批判的文论思想、各类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文学思考，虽然一时遮蔽，却难掩其思想价值。一方面，“被批判”的文论思想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黄秋耘和陈涌的“写真实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巴人的“人情论”、黄药眠的“生活实践论”、钱谷融的“文学与人学论”等，这些“被



批判”的思想火种承前启后,内涵丰富,充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因子。它们是“五四”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精神和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激烈碰撞不断融合的产物,也是开启新时期文论多元对话的思想先驱,同时还是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文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边缘化”的文论思考放在20世纪文论发展大背景下价值凸显。比如,远离阶级性和政治的钱钟书文学思想属于当时的“边缘化”理论,其《管锥编》“背离”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常用的“欧化论文体”书写范式。他主动续接中国古代文论的既有经验,采用古代诗文评论的书写格式来实现理论的中西互释和交融。他是较早反思中国文论现代性的理论家,也是较早探索当代文论的中国化语体形式和内容生产的理论家。

#### (四)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初步建构

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毕达可夫和柯尔尊分别在中国高校开设文学理论研究生班,传授苏联文学理论知识并为新中国培养文学理论教研人才。随着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这两本翻译教材的流行,全国中文专业文艺学(文学理论)课程地位的上升,全国统编的《文学概论》(蔡仪主编)和《文学基本原理》(以群主编)的出版使用,新中国第一批文学理论专业人才(童庆炳、王元骧、王先霈等)的涌现,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初步建构起来了。这个体系的时代特色和体系架构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苏联文学理论主导模式和毛泽东《延安讲话》主导模式并行,第一种模式在后来的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实践中影响巨大。二是教材编写体例上流行教材三元结构(文学本质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发展论三元结构,后来衍生为四元、五元结构)、文艺学三板块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种体系性模块化的思维促进了后来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建设的正规化。三是教材的内容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相对弱化文学的审美属性和文学审美主体的能动性。这使得教材具有一定程度的教条化和独断化的缺点,但就整个教材体系而言,其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专业化。四是文

学理论在中文课程体系中地位大大提高,它的政治性与指导性不断凸显。这个变化一方面有利于当时文学理论学科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又束缚了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自由性和独立性。五是周扬组织编写的两部统编教材和巴人的《文学论稿》等自编教材,在整合苏联文学理论和中国经验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一,在结构体例上有更新。苏联教材采用三元结构,蔡仪《文学概论》和以群《文学基本原理》则发展为五元结构,增加了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板块。其二,在具体观点上有新见。比如,巴人编写的《文学论稿》破除苏联教材对文学意识形态性本质的单一性认定,提出文学存在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本质:“现实的本质”说明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反映现实的社会属性,“要在表现我们社会的现实内容的发展上照耀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的思想的光辉。”<sup>[2]</sup>“艺术的本质”则说明文学具有语言形式和感性形象的艺术属性,语言和形象具体显现社会现实。其三,在编写资源上有扩容。蔡仪《文学概论》和以群《文学基本原理》试图融汇中西、结合现实。这两本教材力图将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与古今中外各类文艺思想文艺实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化的文学基本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文学理论教材的中国化建构中一次可贵的集体探索,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融汇中西多元对话的现代性建构的重要起点。

总的来说,虽然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印记,但是中国学人已经初步建构了适合自身国情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关于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的综述参考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程正民、程凯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第六章到第九章相关内容,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陶东风编著的《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第十章的相关内容)

#### (五)文学理论建构方式上出现多向创生之典范

在发展与挫折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方式有三种,即对国外文论的横向移植、对中国

文论的纵向继承和面向多种文论资源的多向创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不够，但却出现了理论多向创生的典范。

一是横向移植。在发展与挫折期（1949—1976 年）和自觉与繁荣期（1976—2012 年）中国特色文论建构都大规模横向移植外国文论，区别在于，前者偏重于移植苏联文论，忽视甚至排斥西方文论；后者偏重于移植西方文论但不排斥其他外国文论。前者所谓的“洋为中用”蜕变为“苏为中用”，这就造成这个阶段文论建构中的单一化和简单化倾向。

二是纵向继承。发展与挫折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是中国现代左翼文论思想的发展和延伸，但是它往往选择性地吸收后者的思想精华，比如周扬的文论思想吸收了鲁迅文论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因素，却没有全面继承鲁迅关于文艺人道主义和文艺独立性的思想。

三是多向创生。这个阶段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原创性成果有三个代表：毛泽东文学思想、胡风文学思想、钱钟书文学思想。首先，它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阅读”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避免了理论空心化。毛泽东文学思想“阅读”中国经验的重点是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斗争互相促进的伟大实践；胡风文学思想“阅读”中国经验的重点是中国左翼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和文学审美主客体在错综复杂的对话中呈现的宽广深厚的实践活动；钱钟书“阅读”中国经验的重心是反思文论现代性和体系化，回归传统文论。其次，这三大理论成果的多向创生在形式上表现为吸收多种语体形式和表达方式。最后，这三大理论成果的多向创生在内容上表现为消化吸收各类文论思想并自成一格，多向度多层次兼收并蓄并独创新知。

## 二 1949—1976 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之研究路径

### （一）历史经验的整体化研究

虽然发展与挫折期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具有统一性和单一性的特点，但是学者整体化研究的聚焦点并不单一或者统一。方兢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三十年（1949—1978）》（中国

文联出版社，2004 年）聚焦“理论思潮”。著作从人物、题材、为政治服务、创作方法、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六大理论潮流来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历程，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文学理论体系政治性压倒学理性，形成了绝对一元化的建构特征。著者反对混淆文学理论的政治评判和学理分析，主张从自身逻辑和实践检验两结合的层面评价某一文学理论命题或者思潮，防止对文学理论思想成果的简单化评判。高建平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聚焦“理论体系”。从政治化的学术批判到政治化的教材再到政治化的文学体制和文艺政策，这本著作以“分析报告”的形式展示了发展与挫折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针的意识形态性权威文论话语的同一化、体系化过程，认为“新中国文学直接承继的是以延安文学为正统的左翼文学传统，而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sup>[3]</sup>。著作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化、民族化建构上的功绩，同时也批评了这种文论话语在思维方式和批评阐释上的诸多弊端。发展与挫折期文学理论建构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受到后来不少学者的密集关注，如孟繁华的《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 3 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聚焦“文学与政治结合催生的理论的文本性和经验性”，其将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时代凝结体——《延安讲话》和毛泽东文学思想视为“中国化”的现代性经验的产物。

关于发展与挫折期的两个分段“十七年文学理论”和“‘文革’时期文学理论”，学界整体性研究出现两种态势：敢于肯定“十七年”时期文论建构的正面价值，深度反思“文革”时期文论的反智化反理性建构。冯宪光在《回望十七年的文学理论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 年第 5 期）中面对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文学理论价值的声音，大胆肯定“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有力的指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走向的基本因素”<sup>[4]</sup>。武善增的《文学话语的畸变与覆灭：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河南大学



出版社,2012年)将“文革”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话语演变视为一场话语事件。他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探究了“文革”文学话语及其话语规范(文学理论)的生成、定型、瓦解的流变过程,剖析了这种话语的现代性根源、现代性症结和对文学理性精神的扭曲,其思路避免了以往研究中政治探讨代替学理探讨的局限。

## (二)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经典化和权威化研究

从总体上讲,多数学者都认为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以及毛泽东文学思想从1942年到1978年存在不断经典化和权威化的发展过程,大家都肯定毛泽东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和中国文论建构民族化自主化的光辉典范,但关于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经典化和权威化研究的具体聚焦点,不少论者的观点也有差别。黄曼君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聚焦“比较性”。论著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分别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国古代文学遗产、西方思潮等文学美学理论放在一起比较,探寻“主我”重情、人民史观、民族形式论、文艺功利观等观点或者理念的思想根源。这种研究从多维比较视野丰富了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经典内涵,梳理了它的经验基础,增强了它的权威性和学理性。包忠文的论著《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聚焦“体系性”和“开放性”。论者认为毛泽东的经典思想是一个“完整的、融合着民族化和现代化特点的文艺理论体系”<sup>[5]</sup>。这个体系可以总括为辩证统一的五大理论主张或者说新经验:工农兵的文艺方向;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艺方法;文艺家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做工农群众忠实代言人的文艺道路;发展群众与专家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种研究清晰厘定了毛泽东建构文学理论的历史经验及其体系特征。论者认为不应将毛泽东的经典文学理论固定化,因为毛泽东文学思想原本就是一个开放的经验体系,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周扬、茅盾、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理论阐释和文学实践上都为这个思想体系贡献了珍贵经验和理论智慧。曹霞的论文《〈讲话〉历史谱系的建构(1942—1966)》(《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6年第2期)则聚焦“发展性”。论者发现毛

泽东的《讲话》在毛泽东本人、行政机关和文化机构的政治宣传、知识分子的话语建构等多种角色合力作用下才逐步形成权威性和正确性。

## (三)周扬的文学理论及其“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命题之研究

周扬于1958年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讲话稿,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命题。这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上的一个重大呼吁,不过,目前国内关于周扬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这个命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有很大研讨空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肯定了周扬的“双重建设”构想——文学创作上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文学理论上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论者认为周扬的民族化文学理论构想表达了中国学界试图摆脱苏联文学理论教条主义的诉求,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系统化建设;不过论者并未对周扬的这一命题展开深入分析。岳凯华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周扬文艺思想述评》(《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则较为详尽地解读了这一命题。论者追溯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步骤:从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的倡议到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引出“建立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的文艺批评”的问题,再到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构想,理论逐步深化和成熟。论者高度评价周扬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上的战略意识:“这一系列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构思和设想,体现了一位文艺理论工作者梦寐以求的远大目标和战略思想。”<sup>[6]</sup>论者细致剖析了周扬在“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有益探索:一是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目标以及性质;二是辩证地分析党对文学批评的领导方式;三是从实践反思的角度理解文学创作动机和社会效果的关系;四是合理阐发“两结合”创作方法;五是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庸俗化、神圣化毛泽东文学思想的错误言行。不过,多数

学者没有直接关注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构想，而是对周扬在实践这一构想上的努力和贡献进行了总结。比如，童庆炳的《周扬文艺思想论略》（《东疆学刊》2006 年第 1 期）考察了周扬文艺思想的内在核心：一个中心（人民文学论），两个基本点（艺术真实论和艺术形象论）。这两个基本点归根到底还是围绕着人民文学论这个中心点的，这也是论者对周扬在文学理论中国化建构上贡献的概括。也有学者特别关注周扬在文学理论中国化建构中的矛盾性和两面性，如孙书文的《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影响——以周扬文艺思想为透视个案》（《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就剖析了周扬文论的矛盾：在文论建构中一方面不得不要受到苏联文论的制约和中苏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试图摆脱这种制约和影响，走自主性民族性文论建构之路。

#### （四）相关经典文本、论争事件和重要理论家的研究

这个历史阶段，重要理论家大多参与了文学理论的论争，理论家的经典文本与论争关系紧密。经典文本、论争事件和重要理论家三者构成耦合关系，合力建构了统一化、政治化和他律性为特征的主流文论话语。（钱钟书和他的《管锥编》是个例外）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三者的耦合关系，但不同论者的具体聚焦点有差别。刘锋杰的《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聚焦“生产性和实践性”，著者从百年中国文学政治学创构的视角判定，20 世纪 50 年代，权威的政治性文论话语在批判性的论争事件和理论家的思想改造中逐步溢出文学阐释的边界形成文学政治化的国家生产。方维保的《当代文学思潮史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聚焦“系统性”，论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艺术界出现一系列“改造自己，服务政治”的文学艺术大批判大论争，整个“十七年”的文学理论论争和建设成为文艺国家化运动的系统工程之一。其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彻底的意识形态化和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理论家）彻底的思想改造形成密集的互动关系。李慈健等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聚焦“复杂性和矛盾性”，著

者全面检讨了从 1949 年到 1976 年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论争或者批判事件，剖析了重要理论家的经典文本和重要观点。著者在第三章“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式微（1956—1960）”和第四章“阴晴冷暖的多重变奏（1961—1965）”中试图展现这一时段文学理论论争或者批判中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左倾和右倾的对抗、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纠缠、统一化和多元化的交锋等。胡海和杨青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大争议问题探析》（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年）则聚焦“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著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烛照发展与挫折期的人道主义论争、胡风的批评理论与讲话派文论交锋、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等重大论争事件，解读参与这些论争的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上的贡献和不足。另外，张岱年、敏泽主编的《回读百年：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大象出版社，2009 年）、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文学理论争鸣辑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张炯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等三本编著搜集了发展与挫折期里重要文论家的经典文本和论争事件资料，可资研究者参考。

关于经典文本、论争事件和重要理论家的个案研究，研究者也注意到它们对中国文学理论整体建构的贡献。胡风的经典文本《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论现实主义的路》《论民族形式》和胡风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主流文论话语的大批判，但是从百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看，胡风的文本和理论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最富原创性和自主性的思想成果之一。梅琼林在《胡风现象：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中聚焦胡风的“独特性”，认为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独特性在于：“这种现实主义理论更侧重于文学的主体性和作家作为社会存在及创作个体的启蒙作用，并且构成了中国 20 世纪文艺理论领域中一种较为严密、富有创新价值的思想体系。我们把这种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命名为启蒙的现实主义。”<sup>[7]</sup>其中心问题是强调“写真实”，理论内涵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为主要



内容的文艺观和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对农民文化进行批判之文化观。关于茅盾、冯雪峰、钱钟书等文论家及其经典文本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吴秀明、黄健在《论茅盾对现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中认为茅盾初步构建起了一套以“历史观”“今用说”“真实论”“虚构说”为子系统的现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茅盾将历史文学理论从原先零碎松散的经验表述上升为较系统严谨的逻辑推演,使其具备了现代的品格,这是茅盾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贡献。黄念然、陈朝阳的《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期)认为冯雪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的自觉探索者,其突出贡献是努力构建了政治倾向与文艺创作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人民力”“主观力”“文艺大众化”为核心,并在“鲁迅论”的批评实践得到了检验。王立在《〈管锥编〉审美文化建构的途径——一个主题学研究实践的启示》(《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钱钟书的《管锥编》以主题学方法呈现和刷新了古代多种典籍资料的价值,同时,它为主题学研究在中国的确立、拓展作出了贡献。另外,关于具体论争的个案研究也很多,如王锺陵的《典型论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演化与论争》(《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关注“典型问题”论争;祝学剑的《1950年代现实主义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学术探索》2008年第2期)以《文艺报》的传播视角解读“现实主义”论争;祝学剑的另一篇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关注“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刘欣大的《“形象思维”的两次大论争》(《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发生的两次形象思维论争。以上关于学术论争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这些论争对整个中国文论自主性民族性建构的贡献和启示。

#### (五)教材和课程的现代建构经验研究

学界在评价发展与挫折期文学理论教材和课

程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贡献时,不再简单地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取得的成果,而是对之进行了理性剖析和客观审视。程正民、程凯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要素。关于发展与挫折期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教学,著者的研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著者客观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引进的苏联文艺学教材的正负两面的影响,认为正面影响是苏联文艺学教材为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指导地位,负面影响则是造成我国文学理论教材内容政治化、简单化和单一化等弊端。二是著者客观评价了周扬组织统编的两本教材和他的教材编写设想,认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下册)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在系统性、知识性和规范性方面超过以往编写的同类教材,但是教材也存在话语糅杂等局限性。著者对周扬的文学概论教材编写设想给予高度评价,比如高度肯定周扬提出的文学理论教材要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化的文论的主张。周扬十分强调文学理论和教材建设的中国化,反对照搬英美和苏联,也反对照搬政策,而主张基于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经验和五四以来的文学文论经验,创造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者认为周扬在多年前就为“中国化的文论和中国特色的文论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三是著者高度评价了黄药眠重马列、重传统、重实践、重能力的文论课程教学特色,认为其教学具有中国特色和个性特色,给当下文论教学和中国特色文论建设提供了不小的启发。古风在《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论析》(《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中认为主流话语是建构文学理论教材的轴心支点。百年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总体上有欧美文论、日本文论和苏联文论三个来源,我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的第二个时期(1947—1979年)苏联文论影响力最大。论者提出,此一时期的我国文学理论教材虽然主导思维和框架体例受到苏联文论影响,但是亦有不少创新。比如,“‘形象思维’一词出自俄文,是别林斯基在《艺术思想》一文中创造的术语。不可思议的是,在苏联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却看不到‘形象思维’的位置。



这表明苏联文论界对于‘形象思维’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从 50 年代初期，‘形象思维’一词便引入到我国文论中来了，60 年代，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下册）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也把‘形象思维’当作重要问题来讲。这表明我国学者在学习苏联时，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创造性的。”<sup>[8]</sup>

#### （六）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之新探索

近年来，在经典理论文本的解读中，现当代文献版本学和知识考古学方法频繁使用。关于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多个版本和接受史考辨的成果频出，如潘泽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金宏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与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第 6 期），尹奇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个版本比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 年第 2 期），刘忠的《〈讲话〉的版本沿革与文化迁延》（《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6 期），谷鹏飞、赵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次修订的背景及其诠释学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刘增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版本考释》（《新文学史料》2013 年第 3 期）等。这些研究表明：毛泽东《延安讲话》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中的经典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有着复杂的版本变化和理论重构过程。现当代文献版本学、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丰富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之方法，为梳理百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脉络、认清理论经典化的复杂过程、重新阐释理论经典提供了启示。

话语分析的方法也经常使用，如红苇的《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齐鲁学刊》2004 年第 1 期）和周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难：叙事还是抒情——对茅盾文学理论主张的话语分析》（《汕头大学学报》1999 年第 5 期）。影响分析的方法也在兴起，如罗伟文的《胡风的文艺理论与黑格尔美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和王银辉的《论胡风对卢卡奇的接受与“遮蔽”》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比较分析的方法早已有之，新的研究中比较的元素日益丰富化，如季水河的《毛泽东与胡风文艺理论比较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和刘锋杰的《中国现代批评中的现实主义三类型——茅盾、周扬与胡风比较谈》（《海南师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可以说，新方法新路径的大量涌现和交叉使用，深化了学界对发展与挫折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过程和经验累积的认知，避免了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短板，凸显了发展与挫折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的价值。

总之，新时期以来，对发展与挫折期（1949—1976 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研究正逐步深入，研究视野也在日益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其已经摆脱了从单一的政治化或者阶级论维度判定发展与挫折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研究模式，开始探索从学理性全息性系统性维度全面烛照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正反经验。这种研究理路有利于总结过去，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重构和创新提供科学客观的参照系统。

#### 参考文献：

- [1] 周扬. 周扬文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1.
- [2] 巴人. 文学论稿：上册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35.
- [3] 高建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
- [4] 冯宪光. 回望十七年的文学理论传统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5)：12.
- [5] 包忠文.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3.
- [6] 岳凯华. “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周扬文艺思想述评 [J]. 中国文学研究，1997(2)：71.
- [7] 梅琼林. 胡风现象：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32.
- [8] 古风. 20 世纪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主流话语论析 [J]. 学术月刊，2002，34(7)：16.

责任编辑：黄声波